

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的创建

(1945——1949)

沙健孙 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的创建

(1945—1949)

(上)

沙健孙 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

（代前言）

—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长期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和革命人民艰苦探索、英勇奋斗的结晶，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果。

近代的中国，是一个革命的国度。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革命，从1840年就开始了。在这之后，从太平天国起义、到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的斗争此起彼伏，几乎很少间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的人民革命，无论就其社会内容的深刻、群众动员的广泛、斗争规模的宏大，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革命并不是由少数革命家“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列宁）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矛盾，这是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及其激化，就是伟大的近代中国革命发生和发

展的基础。

近代以来，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欺凌过中国；而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从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到1900年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无不以中国失败、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其根本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毛泽东）因此，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就成了近代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

由于腐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因此，必须首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改变这种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创造前提，开辟道路。

列宁说过：“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摧毁代表帝国主义势力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反动政权，创建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

为创建新中国而进行的斗争，是一个伟大的，同时又是长时期的、艰苦的、曲折的过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首先集中力量投入工人运动，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与国民党的合作，参加了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掀起了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它独力高举革命的旗帜，逐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它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全国抗日战争和四年全国解放战争，即经过二十二年的艰苦奋战，终于从根本上推翻了反动统治，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诞生。

在创建新中国的斗争中，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爱国的知识分子和华侨等，都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就是说，新中国的创建，是全中国人民在革命中协力奋斗的结晶，是他们共同取得的伟大胜利。

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核心。它所制定的适合中国情况、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中国人民的斗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广大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以行动表明了自己是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察民情并依靠群众的坚强的革命者，因而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基于自己在这场斗争中的切身体验所确认的客观真理。

二

把创建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革命的共同奋斗目标，这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结果。

近代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先进的中国人曾经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但是，辛亥革命的流产，宣告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幻想的破灭。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继承了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事业，把它推进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开始了为创建人民共和国而进行的伟大斗争。

不过，即使在这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还是一再地把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重新提了出来。抗日战争胜利

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和若干无党派人士所大力鼓吹的“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就是企图在国民党坚持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主张的人民共和国之外，另找一条道路，实际上就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

这种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对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现实固然是一种批判，在实际上却并不具备现实的可行性。

毛泽东说过：“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帝国主义列强来到中国，不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掠夺中国，发展它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对于它们来说，政治上、经济上不独立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乃是理想的倾销商品的市场、投资的场所与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如果中国成为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就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这是它们不能容忍的。它们既不愿意失去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更不愿意看到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成为它们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毛泽东）

民族资产阶级是真诚地希望中国通过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走上独立、富强之路的。但是，它的力量过于软弱。它没有勇气和能力去领导人民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从而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扫清障碍。代表这个阶级要求的中间派，由于提不出彻底的土地革命的纲领，他们无法动员农民这个最广大的群众；由于缺乏群众基础、不敢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他们根本不掌握军队。因此，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多大的力量，以至往往把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希望，把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创设条件的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让步这种幻想之上。

国民党统治集团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上台，并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来维护自身统治的。作为回报，它必然要为帝国主义势

力深入中国进一步敞开大门。国民党的政权是以地主阶级为其主要社会支柱的。许多地主充当了国民党的官吏，许多国民党的官吏成了新兴的地主。它根本不可能解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束缚，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自由、独立和充分的发展创设前提，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希望国民党统治集团通过进行民主改革，在中国推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更是完全不切实际。中国的反动统治者由于自身社会基础的极其狭窄，由于自身的残暴和贪婪，它是极度脱离人民，因而也就是十分腐朽和虚弱的。它既不能容忍、更经受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蒋介石在上台之后不久就公然说过，“为领导素无政治经验之民族”，“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而“统治最有效能者”，正是法西斯蒂式的政治。他们根本不可能对人们关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作出原则性的让步。证之历史事实，确是如此。

在抗战胜利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民主同盟和其他民主力量的共同努力，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通过五项协议之后胜利闭幕。按照政协协议，中央政权将实行议会制、内阁制（这种体制比较接近于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制度），这对于当时的独裁政体是一种否定；中央应与地方分权，地方实行自治，省长民选，省得制定省宪，这对于解放区政权的存在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保障。这些协议都是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实现国内的和平、民主、团结的。按照这个协议去做，也将会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创设若干有利的条件。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从来没有准备去履行这些协议。相反，在政协会后不到两个月，蒋介石就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号召破坏这些协议，并令其追随者“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不到半年，他就发动了全国内战。不到十个月，他更片面召开伪“国民大会”，将政协协议彻底加以撕毁。某些中间党派、中间人士虽然一再声称自己要“以民主的方法争取民主，以合法的手段争取合法地位”，反动统治

者还是不断地用暴力对他们施行迫害，直至取缔他们的组织，监视、逮捕以至杀害他们个人。严酷的事实教育了他们，使他们逐步放弃了中间路线的幻想，而站到了拥护共产党主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来。

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宣告我们“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独立的中间路线不符合中国的现实环境，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站在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场，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集团、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实现人民的民主而奋斗。差不多与此同时召开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也宣布“本会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自由、民主与和平”。其他民主党派也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国民党的反动政权陷入了众叛亲离、彻底孤立的境地。

毛泽东指出：“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主张，不仅获得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坚决支持，而且最终也获得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拥护。

人民共和国，成了中国人民共同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三

人民共和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它将实行何种政治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着力回答的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人民政权的创建走过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它

是先在局部的农村区域建立，而后经过长期斗争，逐步扩展，直至推向城市、推向全国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人民政权建设的多方面经验。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抗日时期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已经对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等做出了原则性的论述。

在全国解放战争的后期，为了迎接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以及同年6月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一步具体地描绘了新中国的蓝图。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进一步对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等问题做出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明确规定。

（一）关于国体

所谓国体，是指国家的性质，即国家的阶级性，也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

毛泽东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他强调，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它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它还应当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

《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国体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二）关于政体

所谓政体，是指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

毛泽东提出：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他的答复是：“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而应当“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政体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三）关于国家的结构形式

所谓国家结构形式的问题，是指国家的结构是实行单一制还是联邦制等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筹建新中国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一步确认，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平等原则的实现。据此，周恩来向政协代表报告时说：“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新中国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

（四）关于政党制度

所谓政党制度问题，是指实行苏联式的一党制，还是西方式的两党制、多党制，或者是有中国特点的新型政党制度的问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建立了合作和协商共事的关系。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

府”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成功和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而奋斗。毛泽东指出，民主党派应“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随后，他们便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参加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参与新中国的创建工作。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标志着这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有了自己的政治形式和组织机构。

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而其中的国体，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具有最根本的意义和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制度，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有着极大的优越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具有伟大的意义。它使得中华民族一洗百年来蒙受的屈辱，开始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它使得长期以来受尽压迫和欺凌的广大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第一次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真正到来了；它使得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匪患不断的历史从此结束，国家基本统一，民族团结，社会政治局面趋向稳定，各族人民开始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人民可以集中力量从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建设的时期开始到来了。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基本上得到了解决；这就为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创造了政治前提和重要的制度基础。

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时候，中国的人民领袖毛泽东曾经以诗一般的语言向世人宣告：“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

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一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六十年的历史，已经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个伟大预言的科学性。

沙健孙

2009年5月

题 记

《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的创建》一书，主要叙述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创建新中国而奋斗的历史。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的时期。“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的这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定胜负的斗争，构成了这个时期历史的基本内容。

这场斗争，是在政治战线和军事战线上同时进行的，而主要地是在军事战线上进行的。所以，人们习惯把这个时期称作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者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这个时期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开始，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前后历时四年零将近两个月。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凯歌行进、赢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的年代。这个时期所进行的这场斗争的影响是如此的巨大而又深远，它不仅导致了旧中国的灭亡和新中国的诞生，而且从根本上规定了尔后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为什么中国只能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而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为什么中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两院制？为什么中国会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搞西方式的多党制？为什么新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实行联邦制？为什么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会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都可以从这个时期的历史经验中找到答案。

战后的政治形势，从根本上说，对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斗争是有利的。但是，通向新中国的道路仍然艰难而又曲折。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独裁、反共的方针，企图使中国回复战前的状态，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这个方针得到了世界上的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美国的支持。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本身对中国人民的斗争是一种支持，它也给予了中国共产党以某些实际的帮助，但它的领导人由于以为中国进行革命战争可能引发世界战争而一度采取不准中国革命的政策。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科学地分析了战后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制定了对待国民党、对待美国、对待苏联的正确的方针，以无产阶级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略思想和把原则性、灵活性结合起来的革命策略思想武装了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保证中国革命得以绕过暗礁、克服障碍，走向胜利的坦途。本书第一章所讲述的，就是这方面的情况。

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46年6月底全面内战爆发，这是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到国内革命战争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曾经试图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实行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即准备经过比较长期的迂回的道路走向新中国这个目标。为此，它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以积极的努力推动重庆谈判特别是政治协商会议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议，并为维护这些协议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与此同时，它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分析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本质，不对它寄予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在争取和平民主的同时，在解放区抓紧开展减租（后来是土地改革）、生产、练兵的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反内战的斗争，使自己和广大的革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可能发动的全国性的反革命内战，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处于有准备的状态。本书第二章所反映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过渡阶段中所进行的这两个方面的斗争。

当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定不移地领导解放区军民以革命战争去反对反革命战争。从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到1947年6月底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之前，这是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中国共产党认定，蒋介石的进攻是必须打败的，也是能够打败的。它采取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原则和依靠农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政治方针，坚决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经过8个月的作战，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就被粉碎了；之后，解放区军民又在打破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的斗争中赢得了重大的胜利。本书第三章，主要叙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进行的自卫战争及其发展。

这个时期，中国境内实际上形成了两条战线。国民党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之后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高涨，促进了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本书第四章叙述了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和发展，概括了学生运动的基本经验。

从1947年6月底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到1948年9月开始进行战略决战，这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先后转入战略进攻并取得重大胜利。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中国的反动派将无可挽救地走向灭亡。这是本书第五章所叙述的主要内容。

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后，中国共产党及时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新区农村政策和城市政策，并为增进全党的政策观念、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而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从而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做了政治上、思想上的最重要的准备。本书第六章主要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上述纲领和政策的制定、实施的情况，概括了党在以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武装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方面的经验。

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人民解放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革命的、正义的性质，使它必然要获得中国广大的人民，特别是占人口最大多数的群众——农民的拥护。在进行解放战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领导广大农民开展了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改革，这就是轰轰烈烈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以便消灭腐朽的、反动的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确立农民的土地私有制。翻身农民给人民解放军提供了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的支援，使中国革命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本书第七章专门论述了解放区的这场土地改革

运动及其伟大的意义。

与解放战争胜利发展、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所实行的依附美国、厉行独裁、坚持内战的政策，以及让美国垄断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相结合垄断社会的政策，使国民党统治区陷入了深刻的经济和政治的严重危机。爱国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起来。中共对民主党派领袖人物、民主人士的有效工作，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们的残酷压迫，促使他们走向革命化。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独立地和充分地发展资本主义这种政治主张，即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在实践中遭到了幻灭。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扩大，与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陷入了全民的包围之中。这些情况，是本书第八章所叙述的主要内容。

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同国民党军队展开战略决战，由此消灭了国民党赖以生存的主要军事力量；随后，又粉碎了美蒋为保存残余反动势力、以便卷土重来而策动的“和平阴谋”，进行了胜利的渡江战役和向全国的大进军。中国人民终于在辽阔的中国大陆上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新中国的诞生扫清了障碍。本书第九、十两章反映了上述情况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丰富、发展。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分析中国社会的状况，精心绘制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蓝图，包括它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政党制度，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工作总方针，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等等。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联合发起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宣告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诞生。人民共和国的创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它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开始。中国历史由此掀开了全新的篇章。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为进行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富裕开辟了道路。本书第十一章反映了筹备创建新中国的情况，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意义，分析了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原因，

概括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基本经验。

参加本书撰写的，有6位作者。

第二章《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第十章《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作者为何仲山，1943年3月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以上两章的另一作者蔡成喜，1963年9月生，为中共党史专业博士。

第三章《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第五章《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第九章《伟大的战略决战》的作者为姚杰，1924年4月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第七章《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的作者为董志凯，女，1944年8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第八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的作者为王顺生，1943年12月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第一章《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政治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策略》、第四章《第二条战线的开辟》、第六章《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的制定与实施》、第十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以及附录《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1949—1956）》的作者为沙健孙，1934年2月生，北京大学教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教授。

本书的《参考文献要目》的编辑者为杨先红，1954年7月生，北京大学馆员。

本书主编
2009年6月